

国民音乐教育之 诗说中西音乐史

熊岸枫 周建琼◎著

 華文出版社
SINO CULTURE PRESS

作者简介



熊岸枫，男，1969年9月生，湖南安化人，现任怀化学院音乐舞蹈学院音乐理论专任教师，主要担任中西音乐史的教学工作。



周建琼，女，1976年6月生，湖南沅江市人，现在怀化学院少数民族预科教学部工作，研究方向为高校教学管理、高校档案管理。

国民音乐教育之
⇒ 怀怜——健音乐史

熊岸枫 周建琼 著

 华文出版社
SINO CULTU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民音乐教育之诗说中西音乐史 / 熊岸枫, 周建琼
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9.11
ISBN 978-7-5075-5200-3

I.①国… II.①熊… ②周… III.①音乐史-研究
-世界 IV.①J6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34442号

国民音乐教育之诗说中西音乐史

著 者: 熊岸枫 周建琼
责任编辑: 宋军占 雷 平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cbs.com.cn>
电 话: 总 编 室 010-58336239 发行部 010-58336238
责任编辑 010-58336225
印 刷: 北京美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1.25
字 数: 271千字
版 次: 2019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978-7-5075-5200-3
定 价: 4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在母校怀化学院建校六十周年（1958—2018）
校庆之际，谨以写作此著的忠诚，向我最挚爱的恩
师李强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

序

首先，就请朋友们允许我来谈谈创作过程与创作动机吧。

如果从我萌生文学梦的那一刻算起，到实实在在的初步形成本著，这一段路，前前后后磕磕绊绊地经历了三十多年。这三十多年的风吹雨打，许许多多的细节依旧鲜活。而最为重要的是，在我的思想深处，它们从来未曾中断过，这也就成了我逢人就能骄傲地说“这本书写了三十多年”的一个强大的精神信仰。

事实就是这样的！从1985年前后的初中阶段（1986年初中毕业）开始产生投身于文学创作的想法，并开始有少量的小说、歌词、谱曲等方面的创作活动。1986—1989年三年高中学习期间，痴迷于文学创作。1989—1993年四年在家务农期间，开始在《安化报》《散文选刊》公开发表散文诗、散文短评。本专著所选用的内容，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1993—1995年两年在怀化师专读书期间，一首诗歌在全国的诗歌评比中获得优秀奖；在《怀化师专报》也多次发表文章。1995—2002年在益阳师专的七年工作期间，在《益阳师专学报》发表7000字的文学评论，该评论在发表之后在国内文学评论界有一定反响，并入选由雷达主编、李文琴编选，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5月出版的《路遥研究资料》一书，该评论后来又在本人的2013年于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专著《国民音乐教育论》中得到体现；多次在《益阳师专报》发表诗歌、散文。


2002—2005年三年在贵州大学读研期间，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多首诗歌作品被收入本专著。2003年到现在，从未终止文学创作，两次在《怀化学院报》发表诗歌，等等。

可以这么说，文学创作给予我的那份踏实沉稳、自由愉悦的感觉，是任何其他事物无法取代的。它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而是真切的家园。我不存在坚持，是无以言说的挚爱让我们一路相伴，哪怕我并没有取得过瞩目的文学成绩也完全没有关系。在我们的世界里，我很享受这一份真实与宁静、别致和从容。

那么，为什么要以《国民音乐教育之诗说中西音乐史》作为书名，而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性或者很诗意的名字呢？这和我目前所从事的音乐教育工作有关系。音乐是我的工作，而文学是我的挚爱，将二者结合在一起来做一些目标高远、很有意义的事，是一种珍贵的钻研探索，而不是功利主义或者文学艺术实用主义。

随着怀化学院中西音乐史课程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发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的时候，我就逐渐想到了：如果能以诗歌的方式来辅助对于学生来说十分艰深的音乐史学习，并结合本人确立的研究方向“国民音乐教育”来拓展文学创作——主要是诗歌创作——的功能，以回应国内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以来甚嚣尘上的“诗歌无用论”“诗歌颓废论”等说法，完成我本人所期望的运用“多位一体”的架构来实现全民共享共建的国民音乐教育工程体系的建设，我又怎能不去大胆地试一试呢。至此，《国民音乐教育之诗说中西音乐史》的总体轮廓及创作铺展得以正式形成。

为此，我和我的夫人周建琼女士各自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在2013年完成第一本专著《国民音乐教育论》的相关任务之前，我对中西音乐史一些内容的诗歌化写作就开始了。周建琼女士发挥其档案整理工作之所长，搜集了很多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同时还展开研



究并撰写档案学方面的文章，为写作进程提供实质性的支持。经过了五六年的时间，到2018年9月，音乐史板块的写作初步完成。我的想法是：为我的学生和读者们提供一种全新的读音乐史和读诗的方式，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让诗意的情怀汹涌流淌。它不是史诗，有的时候它更像口述历史，在四通八达的关联中寻求着文化的意趣和诗意的升腾。我很不满意我个人的创作水准，或许，假以时日，它将以另一种面孔呈现，它也许会变得更好一点。

我要衷心感谢杨荫浏先生、于润洋先生、陈应时先生、陈聆群先生、商传先生等人。这些杰出的前辈大师们在音乐文化和史学领域的重大贡献及成果所形成的强力支撑，是本著得以完成的关键因素。我贪婪地汲取，却又充满了惶恐，我拙笨的写作水平与创造能力会否让这些光辉灿烂的大师们脸上蒙尘？唯愿我的竭尽全力和赤子之心，可以描绘好景致，谱就新华章，唱出好声音。我的同龄人与同行者，如果你我同为有志者，请真诚地批评，也请多多支持。谢谢！

2018年11月16日写于怀化学院

本书缘起

“面向全体国民的音乐教育”“将音乐艺术实实在在地送到全体国民的手里边”，是我的第一本专著《国民音乐教育论》的核心理念——在内心深处，我是把它当作承诺来看待的。所以，从《国民音乐教育论》正式出版至今，我就一心想着该采取怎样的方式和途径来有效地兑现这个承诺。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前提，我才得以成功申报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4年度一般课题“国民音乐教育的文化属性与实践途径研究”（课题编号为：XJK014BTW015）。该课题设定的核心成果即为专著《国民音乐教育之诗说中西音乐史》。


为什么将专著名称定为“国民音乐教育之诗说中西音乐史”呢？我想，无论从个人的写作理想、价值取向等缘由还是从国民音乐教育的目标来看，它都是十分充分而又明确的。

我从小热爱文学，在写作《国民音乐教育论》时就比较多地想到过“文学与音乐相结合”“诗与歌相结合”的问题，还在书中刻意排了一篇我于1997年在《益阳师专学报》公开发表的文学评论《生存困惑与乡土中国的必由之途：路遥的启示》。还有，我一直十分信奉“功夫在诗外”的道理，特别是当它关乎音乐教育这个议题的时候我认为尤其如此——音乐是感性特质特别突出的一门艺术，“自律”固然十分重要，但“他律”却也因此而更加须臾不可

少——这才有了该书“内容简介”中“‘关联篇’……力求向更为宽泛的领域寻找突破点，对‘基础篇’形成支撑”这句话。毫无疑问，这正是为本书《国民音乐教育之诗说中西音乐史》埋下的一个伏笔。

无论是从事音乐教育、音乐创作、音乐表演的专业人士，还是一般性的音乐爱好者，首先都必须要领会一个问题：音乐艺术不应该是任何意义上的“名利场”，而是“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的自然而然的生活情态和优美静谧的人文生态。在笔者的构想中，这是国民音乐教育的终极目标。因此，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国民音乐教育的舞台必定是博采众长而又从善如流的，不仅仅是文学，还有其他领域，有益于建设的一切积极因素，它都应该持有一个开放、积极借鉴、有效融合、“与众乐乐”的状态。这本来就是艺术生成及审美发生的基本属性，而被人们称之为“艺术皇冠”的音乐，难道不应该更加如此吗？然而，遗憾的是，长时间以来，笔者所看到的景象却是：一些从事音乐工作的人士，以“专业性”为名，高筑壁垒，自设城墙，恨不能把音乐养成温室里的“花花草草”，而且，他们还常以艺术的名义，把音乐关进所谓的“大雅之堂”，但是为了博取名利，音乐又可以沦为“媚俗妖姬”。可以说，这已经从根本上脱离了音乐艺术本应根植的深厚土壤。

在笔者的理念和实践中，音乐学的专业建设和国民音乐教育的建设，相辅相成，水乳交融。之所以这样，完全是因为笔者以国民音乐教育为国家文化建设献一份力的赤诚和理想，从一开始就秉持了一个开放多元共建共享的方向和信念。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国民音乐教育的民族性。笔者在本书“基本篇”的《20世纪中西音乐文化其他大事记：蓦然回首，伊归何处》一文中，对于中国音乐文化大事的取舍，将长期以来关于民族根性音乐文化运动轨迹及规律



的思考，采取了毫不避讳的鲜明态度。既然它如此重要，却又将其置放（或“定位”）在“其他大事记”中，同样表达了一个鲜明的态度：我们对“中国音乐”或者说“中华民族音乐”的正统与源流的传承与教育的体系建设，任重而道远。

最后，因《国民音乐教育之诗说中西音乐史》属于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4年度一般课题“国民音乐教育的文化属性与实践途径研究”的核心成果，所以，将该课题的开题报告附录如下，会更加方便读者朋友们了解本书的写作意图。

一、选题意义与研究价值、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问题的提出、课题界定

1. 选题意义与研究价值

普及型、公益性、宽口径的“国民音乐教育文化属性和实践途径研究”最大的意义在于，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国民音乐教育研究的瓶颈，使“国民音乐教育”的称谓与“国民”这个名词的内涵和外延名实相符。在课题主持人已经于2013年6月正式出版的40万字学术专著《国民音乐教育论》的基础上，本课题将以文化属性的研究为起点和依托，瞄准更高的层次进行深度拓展，其根本的目标是要将理论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始于乐，兴于艺，达于文，成于境”，是开展本研究的根本意义之所在。音乐艺术在教化人伦、强健品格、养成文化等智性启迪功能方面，具有一般教育手段所达不到的特殊力量。同时，在传播途径、手段和具体工作的各类基础操作方面，它还具有其他艺术门类所难以比拟的可塑性和便捷性。对于国民文化的复兴，选择音乐教育作为起点，将会使目标的实现之努力事半功倍。但是，由于多年来国内在涉及真正意义上的“大国民”层次的研究成果少之又少，而在这些少之又少的东西中，真正称得上学术研究成果的，也

只是一些零散的、片段性的文字，与真正意义的国民音乐教育所能做和能够完成的、必须要做和必须要完成的工作与目标，以及当代社会对于国民音乐文化建设的客观需要，还存在着较大的距离。特别是到了实际操作环节，因为缺少科学依据，常常陷入一筹莫展的尴尬境地。


所以，基于国家国民文化复兴宏伟目标，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非物质文化发展宏观战略要求，以科学性、体系性为标准，以实际生产力的获得为根本目标的国民音乐教育文化属性和实践途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

2.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本课题研究现状述评的重心集中在国内的研究成果上，时间跨度从1994年3月樊祖荫先生在《人民音乐》发表论文《李凌的国民音乐教育观》到2013年10月詹皖先生在《中国音乐》发表论文《张謇音乐思想及其影响之研究》，前后将近20年的时间，共涵盖6部学术专著和11篇学术论文。另外，国外的研究成果也选取了有代表性的两部专著，即：两位美国学者雷默和弗罗姆分别所著的《音乐教育的哲学推进愿景》（人民音乐出版社2011年8月版）和《健全的社会》（欧阳谦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7月版。弗洛姆写作此书的实际时间为1955年）。


对于上述研究成果，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进行归纳：

首先是与本课题研究方向紧密相关的一方面，在樊祖荫的论文《李凌的国民音乐教育观》中提及，李凌先生音乐教育观的核心是：“要提高我国的音乐水平、提高全民族的音乐文化素质，不仅要大力发展专业音乐教育，更要重视整个国民音乐教育”。旗帜鲜明地倡议开办社会性音乐学校，因地制宜地开展群众性音乐文化活动。与此相关的论文还有王志军先生的《李凌社会音乐教育实践和



思想的当代启示》等。而左峰先生于2007年发表的《国民音乐素养提高与社会和谐发展》一文，更是从“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层次论证了整个国民音乐素质培育的价值指向和重要意义。虽然，其论证过程的一个重心仍为学校音乐（中小学基础教育）的基本框架，但是该环节的方法论构成却突破固有局限，将国民音乐教育目标的实现与“功夫在诗外”的宏大视野相关联，在凸显国民音乐教育本身的文化张力的同时，实际上也明示了一些充满潜能的实践途径。与此相关，周海宏先生在其《国民音乐审美素质的构成与国家音乐教育体系的结构和层次》一文中所提出的“国家音乐教育体系”观念，则从一定高度完成了某种建设性的构想，即：“国民音乐生活——国家音乐教育行为——专业音乐表演与创造活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上述三家之言至少是从观念性的一般倡议层次初步解答了国民音乐教育的基本属性问题。而美国学者弗罗姆在《健全的社会》中，以其体系性的论证充分挖掘了艺术教育对于人的一生稳健生活与人格成长的特殊重要性。此类中外研究成果的前后结合，已经能够较为完整地呈示国民音乐教育的基本轮廓和关键线索。笔者于2013年出版的学术专著《国民音乐教育论》，正是建构于这一基础的铺垫之上。第二，从应用性研究的方向进行考量，此类成果十分丰富，涉及国民音乐教育方方面面的一些工作规律及方法论的总结。当然，根据本研究的论证方向，也必然要对跨领域的整合应用进行考察与分析论证。比如，冯亚先生的论文《露天音乐艺术观赏的礼仪与文明观众的培育》，论及群众音乐文化活动中基本的文化素养问题，它关乎国民音乐教育的社会效应和子体系建设、音乐文化的社会传播伦理建设等一系列工作。在冯先生的论文中，细节罗列与理论探析的并置将“观众文化”（或称为“观赏文化”）的轮廓和盘托出。这是国民音乐教育的各类单元工作实践必

将面临并且需要切实解决的一个难题。围绕本课题最终成果的体现形式，李晖先生的论文《在音乐教学中融入诗歌的学习》和冯长春先生的论文《艰难的突围——“重写音乐史”史学思潮的回顾与思考》，分别从音乐教育的跨领域整合功能和音乐史论教科书的书写空间进行论述，给单元创新和综合创新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第三，从宏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非物质文化发展的研究情况来看，在进入21世纪以来的十多年中，国内的成果在质和量两方面都有了较为扎实的增长。在所有这些成果中，以艺术特别是音乐文化作为研究对象的项目，占据了很大的篇幅，已经搭建起一个体系性的广阔平台。再者从国民音乐教育的研究情况来看，有关“乐教”和美育的理论成果十分丰富，业已形成一個立体多元而又十分严整的体系链。此外，本研究得以充分衍展的核心基础，是纯形态意义上的广义音乐学，其各个专属领域（含边缘学科）的研究成果也是比较丰富的。相对于本研究来说，所有这些方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条块清晰，互为关联，为一些专属方向性应用与综合应用的研究工作和事项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性的铺垫。还有面向全体国民的“国民音乐教育研究”离不开广义的教育学、文化学、社会学、民族学等方面的支撑，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根基深厚，在量与质两方面都完全可用“汗牛充栋”来描述。相对于本研究，选取美国学者雷默先生的学术专著《音乐教育的哲学 推进愿景》作为代表，它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切入：①传统的教育学、文化学、社会学、民族学等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已经产生的效应，在整合或者综合的维度上已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重点体现在实际的研究应用上主客体之间稳定的立体主从关系的自觉配置与科学实践。从其社会反响来看，传统的价值是值得充分肯定的；②进入21世纪以来，从中外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来分析，它们大体上比较好地顺应了信息化时代社会



的变化发展规律，也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突破。以上所考量的只是与本研究直接发生作用的一些领域，在研究过程中，它必然还要涉及一般性哲学、历史学、管理学、经济学等方面的问题，甚至于自然科学领域的某些成果，在某种情形之下，也应适时适当地大胆予以借鉴和运用。这些间接层面的研究成果，一是因其庞杂，二是因其将在本研究的实施过程中融会贯通，故不在此作专门的研究现状述评。


目前存在的不足之处：上述成果主要的问题在于，没有从国民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体系性的高度来全面进行建构。而笔者的专著《国民音乐教育论》虽然初步从系统性的层次对国民音乐教育的理论做了探索，但是，其体系化的道路仍然十分艰巨。更加值得重视的是，长期以来，关于国民音乐教育的“名”与“实”的问题，还存在一些比较明显的认识 and 定位上的误区。如陈宗花先生的论文《新时期国民音乐教育改革研讨会综论》，理论来源就是1986—1998年期间召开的7届新时期国民音乐教育改革研讨会的中心内容，其观念的核心建构，基本上是将国民音乐教育与中小学基础音乐教育相提并论。长期以来，类似的观念、研究成果和实践，仍然大有市场。诸如这些，都是本课题定位于应用型研究的动力所在。只有进一步深化国民音乐教育的理论研究，在此基础上扎扎实实地实践并进行深刻总结和展开相关研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总之，无论是从历时性还是从共时性来考察，普及型、公益性、宽口径的“国民音乐教育文化属性和实践途径研究”课题都是基于上述成果的基础提出的。以此作为基点，进一步延展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前景和规律性这样的广度与深度，并力求落实到应用的层次，为研究本身增添了更加强大的生命力。

3. 问题的提出

国民音乐教育属于国民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学理想和中国梦研究的目标之一。本研究对其展开文化属性及实践途径的研究，主要还是围绕高等院校科研成果如何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如何切实服务于社会发展需要这一目标而树立的。该研究的前期准备工作历时整整17年（1996—2013）。课题主持人于2013年6月在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了学术专著《国民音乐教育论》，并赢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该书分为基础篇和关联篇，其围绕国民音乐教育“宽口径”这一目标，从一个新的角度和高度阐述了国民音乐教育客观存在的目标、使命及在此基础之上的各单元拓展。“基础篇”力求解决理论方面的某些关键层面的问题，主要是从基础定位和单元构建两个方面进行探索，创造性地回答了“何为‘国民音乐教育’”和“实施国民音乐教育的关键性环节与重要步骤”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关联篇”主要是作者在多年的国民音乐教育教学实践中所积累的一些经验总结及相关成果，侧重于实践层面的建设，并力求向更为宽泛的领域寻找突破点，对“基础篇”形成支撑。该著立足于大国民音乐文化与大国民音乐教育普及和发展的总体目标，倡导让音乐艺术以科学人文的理念、全新的方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手中活生生的现实，对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水平，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同时，其所定位的国民音乐教育新平台建设的构想，将为国家整体国民文化建设提供一份有价值的参考。

本研究正是基于这样的前提，力求朝着更深且更具有实际意义的层次来展开的。通过对国民音乐教育文化属性的分析研究，一方面对于前期理论储备进行深度整合，进一步优化和巩固已有的体系性建构；另一方面又可以努力开拓新的视角，为国民音乐教育树立更加丰富的支撑。而通过对国民音乐教育实践途径的分析研究，旨



在为科学理论服务于社会落实验证和应用的渠道，夯实课题建设良性循环的基础。另外，在本研究中，对于上述提及的“力求向更为宽泛的领域寻找突破”，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本研究的最终成果之一——《国民音乐教育之诗说中西音乐史》，将以务实创新的方式，清新独特的视角，实践和演绎国民音乐教育的文化整合效应及美育功能。

4. 课题界定

该课题总体上属于应用研究。国民音乐教育的文化属性研究的目的，主要是让综合课题主持人与课题组成员已经取得的理论、实践研究成果和专业建设成果，更好地为国民音乐教育实践途径的研究服务。其具体实施过程，将由大量的基础实践和实验实训教学项目来组成。

二、课题理论依据、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研究假设、创新之处

1. 课题理论依据

一方面，从广义上来说，本课题所具有的深厚理论根基，是自先秦以来的历朝历代直到中国当代这一历史长河中所有关于“乐教”理论与实践成果的积淀所形成的。从狭义来说，是上述这一历史进程中专门针对普及型、公益性、宽口径的“国民音乐教育研究与实践”的这个相对独立的板块，这一部分目前虽然谈不上丰厚，但也可圈可点。另一方面，本课题主持人已经专门针对“国民音乐教育研究与实践”的主题正式出版了40万字的学术专著《国民音乐教育论》，其他课题组成员也取得了与此相关的扎实成果。

2. 研究目标

本课题主持人前后经历17个年头（1996—2013）终于写成学术专著《国民音乐教育论》，下一步的目标就是要将理论成果转化